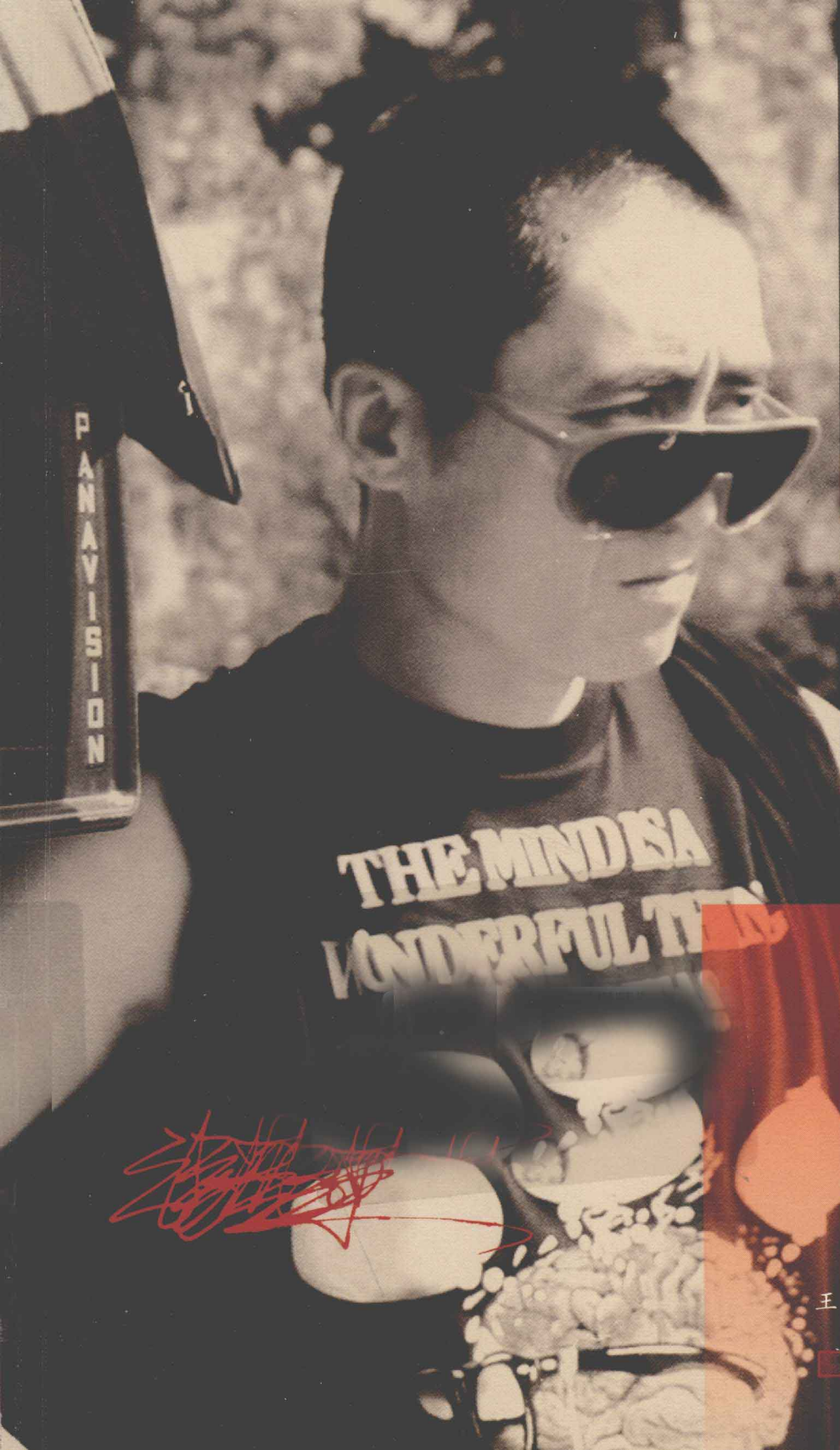


活着 · 张艺谋

王 斌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活着 · 张艺谋

王 斌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活着·张艺谋/王斌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02-008664-1

I. ①活… II. ①王…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20967号

责任编辑 脚 印 赵 萍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校对 罗翠华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58千字

开 本 730×960毫米 1/16

印 张 14 插页3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1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664-1

定 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活着》的故事梗概	1
1. 确定拍摄	3
2. 见到余华	8
3. 好感觉	17
4. 男主角 女主角	21
5. 活着的还活着	31
6. 以柔克刚	36
7. 巩俐的恶作剧	43
8. 法国文艺骑士勋章	45
9. 到西安	53
10. 家珍性格讨论	57
11. 往舒服里拍	65
12. 开机	70
13. 第一次亮相	77
14. 标新立异	83
15. 打知了队	91

16. 压力	96
17. “怵”巩俐	103
18. 考察小演员	107
19. 发怒	115
20. 工作狂	120
21. 折腾	127
22. 破“第五代”	131
23. 找乐	139
24. 不要造势	143
25. 葛优爱狗	151
26. 拼的是努力	158
27. “在劫难逃”	167
28. 最后一场戏	172
29. 葛优的担忧	179
30. 最后的目的地	184
31. 一切都结束了	191

附录：

张艺谋电影作品获奖一览表	199
张艺谋电影所获荣誉	203
后记：往事如梦	204

《活着》的故事梗概：

富家少爷福贵终日沉溺于酷赌中，终于将家产尽数输给了皮影班主龙二。福贵的妻子家珍因劝赌未成，拖着有孕之身带着女儿凤霞弃他而去。福贵父闻知，一病不起。

在贫困中挣扎的福贵只能卖货为生。家珍知福贵劣性已改，携儿带女返回其身边。

福贵向龙二借了一箱皮影，沿街卖唱，不料被“国军”抓去当民夫。

一天深夜，从战场上风尘仆仆返回家园的福贵，在大街上偶遇家珍和女儿凤霞。

全国解放后，龙二因拥有当年福贵的家产，被定为地主，又因抗拒政府法令，要被依法处决。在公审大会上，福贵与家珍言说：“一定要好好活着。”

50年代，大炼钢铁，赶超英、美的口号震天动地。福贵之子有庆的同学来找有庆，说是区长要来学校检查工作，老师叫学生去学校炼钢。福贵不顾家珍阻拦，动员有庆去了学校。

有庆到学校后因过度疲劳，倒在一座墙根边就睡着了；而区长也因几天几夜的奋战筋疲力尽，开车时不慎撞倒了一面墙，墙下恰恰睡着有庆……福贵、家珍悲恸欲绝。

在掩埋有庆的坟头上，福贵认出撞死有庆的区长就是当年同甘共苦的“战友”春生，顿时怒不可遏。春生无言以对。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镇长来到家中劝福贵烧掉皮影，因为那是属于封建主义的“四旧”。并顺带谈起要给他们的哑巴女儿凤霞介绍一个对象。

一日，镇长带来了“对象”二喜，虽说是个瘸子，老俩口还是瞧着挺满意。

结婚后，凤霞随二喜离去。

一个寒冷的夜晚，春生突然来访。此时的春生已被作为“走资派”折磨得不成人样，有轻生的念头。家珍终于原谅了春生，当春生在夜色中远去时，家珍突然对着春生的背影高喊：“春生，你记住，你还欠我们家一条命呢！你要好好活着。”

凤霞要生孩子了，老俩口乐不可支，赶到医院去探望女儿。医院的老医生已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关押进了“牛棚”。家珍让二喜去找个医生来，二喜设计从“牛棚”“押”来了王大夫。福贵见王大夫已饥饿难耐，为他专门买了七个馒头。

孩子顺利地生下来了，老俩口大喜。可不久，病房突然传出惊叫声，一护士冲出来，急声喊：“产妇大出血。”手忙脚乱中，谁都没有办法急救；王大夫已被七个馒头撑倒在地，不能动弹。失血过多的凤霞终于不治而亡。

凤霞的儿子馒头终于长大了，福贵和家珍也已从苦难中挣脱出来。他们仍在期待一个幸福的明天。就是靠着这些或许是虚幻的念想和企盼，他们承受着命运……



1. 确定拍摄

●“如果姜文确实不能演了，我就放弃《我是你爸爸》的计划。”

姜文接着说：“是啊！看你艺谋的片子，你好像不应该会喜欢王朔这种挺‘痞’的东西。”

确定拍摄《活着》对于张艺谋而言，纯属一次偶然。

但这一纯属偶然的选择，在我看来确有可能给张艺谋再一次带来巨大的成功，并给探索中的中国电影奠定新的基础。

1992年4—5月间，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后期制作全部完成，但是前途未卜。据参加拍摄工作的同仁介绍，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大家都曾对此片的“未来”持有怀疑态度，以致剧情创作方案在拍摄现场几度易稿，甚至在看样片时大多数人都看得昏昏欲睡，最后干脆离席而去。张艺谋事后回忆说：“常常是看到最后，只有他和摄影师两人坚持到底。”

但是，《秋菊打官司》毕竟成功了，他所受到的“礼遇”甚至超出了张艺谋的预想。那一段日子，他那张冷峻深沉的脸常绽开笑容，以致连我都以为他性格因此有了新的变化。

我是在《秋菊打官司》的首映式上与艺谋再度相遇。

那天傍晚，当我赶到洗印厂门前时，老远就见艺谋大大咧咧、晃晃悠悠地在路上荡着，眼睛上架副墨镜。我喊了他一声，他转脸看见我，快步迎了过来。走近时，他迅速地摘掉墨镜。他脸上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兴奋。我们寒暄了几句。我接着问：“这片子怎么样？”他稍稍沉吟了一下，说：“反正跟我过去的东西不一样，你自己看看吧！电影局他们看了后说是一片温馨，一片真情。”说完，艺谋自己就乐了。

一会儿，他用他那双让人时刻感到犀利的目光看着我，眼神中似乎在思索

着什么。“你现在在干吗？”艺谋问。“无业游民，在家写点东西。”我说。“哦？”他沉吟了一下，“过一段时间，我要谈一个剧本，你能不能也参加一下？”他又问。我说，“行呀！反正我闲着也没事。”“那好，我怎么跟你联络？”我说我家有电话。他叫他助手拿出笔和纸，我迅速地写下我的名字和电话。艺谋接过去看了看，“你这名字写的是啥呀，能看清么？”我把纸条从他手上接过来，在原来写的名字上划了一道，打算重写。艺谋在一旁“哟”了一声，“你看你，哪有在自己名字上划道的。”他颇认真地说。

就在那一瞬间，我脑子里闪过了他与我见面时摘掉墨镜的动作（以示礼节性的动作）和对自己名字不能随便划道的“警告”，我隐隐觉得这或许也是他性格中的某种东西。

6月底的一天，夜间12点，艺谋打来电话（他总是这个时间来电话），说讨论剧本的时间已定，届时姜文也会参加。地点是北京新大都饭店。要讨论的剧本是王朔的小说《我是你爸爸》。

我赶到新大都饭店时，一眼就看到了艺谋。他挺显眼地站在大厅前的巨幅玻璃旁边向我招手。他告诉我姜文还未到，然后吩咐负责这次讨论记录的场记继续再等姜文，便带着我去预订的客房。艺谋边走边说，当年拍《红高粱》时，定女主角和给《红高粱》的歌攥词就在新大都。这使我联想到，巩俐的表演艺术生涯看来就是在这儿被确定的。当然这还包括张艺谋本人从事导演的人生旅程以及他和巩俐逐渐发展起来的友好关系。他们在当时肯定是无法想到他们今天所拥有的这一切荣誉和成就的。

姜文虎虎生风地“晃”进房来时，第一句话便是：“艺谋，咱们拍《红高粱》时就是在这儿攥的歌词吧？”然后，这两位属“虎”，但年龄却相差一轮的影坛“腕”级人物，兴奋不已地回顾起当年拍《红高粱》时的情景。姜文记忆中最念念不忘的是拍《红高粱》时，剧组同仁不分高低贵贱，没有等级之分，脏活苦活，大家都齐心协力地一块儿上，有一股“玩儿命”的劲头。

“有这股劲，电影才能‘牛逼’。”姜文感慨地说。

艺谋也颇为抚今追昔地感叹了一声：“现在拍电影不行了，我只要在那里



站着,就有人给你搬凳子,要你坐。不过我还是比较警惕的。”

姜文接着又谈及他前一段日子又看了一遍《红高粱》。他说,几年后再看仍然有味,并且说在张艺谋所有的四部电影中,他最喜欢的是《红高粱》和《秋菊打官司》。他认为,《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显得太使劲,不松弛,看了不舒服。

艺谋乐呵呵地听着,不时地点点头。但我看得出,尽管如此,他仍持有自己的态度。

接着,艺谋要我们谈谈对《我是你爸爸》的看法。我和姜文对视了一眼。我发现姜文的态度中也有一丝迷惑。我说,我不明白艺谋为何要选择这篇小说。姜文也很快接着说:“是啊!看你艺谋的片子,你好像不应该会喜欢王朔这种挺‘痞’的东西。”

艺谋笑笑说:“我本来不想先说,我怕先说了会限制了你们的想法。但现在看来,我不说,你们也不会先说。”他说,《我是你爸爸》是他在外景地时看到的。当时看完,就觉得这篇东西不同于王朔一般的小说,痞归痞,但里面还藏着一种很有意思的东西。而且他觉得这篇东西只能由姜文来演。他说他在和姜文合作《红高粱》时就发现姜文有喜剧天才,而这一点却被许多导演所忽略。

艺谋接着阐释了他对《我是你爸爸》剧情改编的整体设想。他认为,一部好片子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原作中,应当充分发掘小说中最有意思的“核”,但要摆脱小说中的“痞气”。他觉得小说中所体现出的父子关系还是颇有趣的,它曲折反映出一个大的时代氛围。但一定要从小说中走出来。

那几天,我们天天集中在“新大都”侃剧本。艺谋十分善于牢牢地把握故事的整体结构和走向,而姜文则充分发挥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不断冒出一些妙趣横生的细节和对话,得意处甚至一本正经地进入角色,当场献技,表演一把,引得我和艺谋哈哈大笑。他设想的那位男主角脸部特征是“地包天”,并且是某区文化馆的干部,经常莫名其妙地陶醉在虚幻的想象中,面对现实却一筹莫展,所以和儿子闹出了一系列荒唐的事儿来。

有一次,姜文向艺谋“咨询”当导演的问题,因为那时他已确定要独立执导

自己的第一部影片。姜文担心的是,他对一些很具体的技术问题,诸如摄、美、录不太懂,会不会对他将要执导的影片构成问题。艺谋非常肯定地说:不会。他认为这些问题只要找好了合作者都好办,而且拍一部片子下来就全懂了,关键问题还在于故事。艺谋认为,对他自己最具挑战性的人便是姜文,因为姜文极其聪明,而且想象力颇丰富,一些奇思妙想说来就来。他说这是一般人很难具备的素质。同时他也谈到了姜文的缺憾。艺谋说,他自己的优势是善于总体把握,让所有的细节都服从于这一总体的统摄。他说,这一点姜文可能拼不过他。但姜文的优势是懂表演,并使剧情细节富有弹性;再就是他富含的奇特想象力。

艺谋在总结自己电影的失误时,承认过去忽略了演员表演应当作为电影中至高无上的主体,再就是忽略了电影的“叙事性”。他说,包括《红高粱》,他当时也不是全部精力关注在演员的表演上,还是较注重造型啦、气氛的营造等。《秋菊打官司》因为是实景偷拍,导演无法控制现场,只能让演员自己去即兴发挥,结果反而抑制了他过去较偏执的东西,演员自然而然地站到了“前沿”。

我们在新大都饭店讨论了一个多星期的剧本,后因姜文临时有事,讨论匆匆结束。不久,姜文出演由周晓文执导的《龙腾中国》;而张艺谋则与巩俐一道携带《秋菊打官司》前往直意大利,角逐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

《秋菊打官司》终于不孚众望,在威尼斯电影节上一举夺魁,荣登榜首。巩俐也因其其在《秋菊打官司》中的出色表演,摘取了最佳女主角奖。

从威尼斯返回北京后,艺谋打来电话,告诉我,《我是你爸爸》可能要“搁浅”,原因是姜文突然提出因另有安排,可能无法接演《我是你爸爸》。

艺谋在电话中显得有些焦急,他说投资和拍摄计划都已拟定好了,姜文的中途变卦使他猝不及防——由他自己亲自动手改编的剧本《我是你爸爸》,当时已接近尾声。

“你说,《我是你爸爸》出来后会怎样?”艺谋在电话中突然发问。艺谋知道我一直是《我是你爸爸》改编成电影成功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



我说我也不清楚，只能等他的剧本改出来后再看。

“剧本即使弄出来这一稿，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他说。

那我就不好说了，我说，因为我对《我是你爸爸》本身就不太喜欢。

“我再找姜文谈一次，看看他的态度。如果他真的无法接演《我是你爸爸》，应该明确告诉我，也好另作安排。”艺谋最后说。

几天后，艺谋在电话中告诉我，他已找姜文谈了一次。姜文的态度已基本明确，要艺谋重新考虑人选，他可能上不了。

艺谋说：“我也明确告诉姜文，这部戏的主演非他莫属，如果姜文确实不能演了，我就放弃《我是你爸爸》的计划。”

“姜文那儿我们不能再指望了，应当另外考虑选择新的剧本。你认为还有什么东西能拍吗？”艺谋问。

我说：“我曾经给你看的余华的小说《河边的错误》，你认为如何？”

2. 见到余华

●从《河边的错误》转向《活着》。

《河边的错误》是我在一次《秋菊打官司》的座谈会上给艺谋看的。记得当时我对他说了一句：余华是位值得注意的作家。《河边的错误》我认为能改成一部有意思的电影。我们在“新大都”讨论《我是你爸爸》时，艺谋曾对我说，等讨论完了《我是你爸爸》，咱俩找个时间再议一议《河边的错误》。他认为，反正这是个小制作，可以在拍一部大片子的间隙，抽空套拍这个《河边的错误》。

“但我还没想好怎么弄。”艺谋最后说。

当我在电话中重提《河边的错误》时，艺谋似乎迟疑了一下。

我说，这是一部挺哲学的小说。它在一个推理小说的外壳里套装了一个极具精神分析内容，并使这个看似杀人的故事具有一种对人性及法律的思考。从整部小说的结构上看，杀人案的侦破都显得合乎逻辑，但最终的结果却因“疯子”杀人而置法律于无奈之中。

“你不觉得这些理念和这个套子挺‘殖民化’么？”艺谋突然反诘道。他接着说：“这些思想和认识我觉得都来源于西方，它不像是我们中国人的事。弄不好还有点西方警匪片的意思。我们今天拍电影，不能再迷恋这些很‘殖民化’的理念。那是前几年玩实验电影的事，今天应当老老实实说点咱中国人自己的事儿。”

我无言以对。我从心里承认艺谋是对的。几年来创作电影的实践来源于现实生活的感受，使他已不再简单地陷入西方思想的熏染中，而更为重视自身对生活的认识。他对受西方的影响而派生出的“衍生物”——小说、电影，都持警惕态度，而且他确实能从自身的体验出发而发现存在的问题。

艺谋嘱我再看看能不能发现更好的东西。



我知道事后不久，艺谋曾动过要改编周梅森一部小说的念头，并请人改过剧本，后终因不理想而放弃。

在此期间，我们也常通电话，互通情况。在一次通话中，我再一次提及《河边的错误》，我总觉得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扑朔迷离的故事改造成一个适合艺谋的片子。

艺谋仍然坚持他原有的观点，他对于过于理念化的作品已没有多大的兴趣了。他过去有几部片子就是玩理念的。他想得更多的是再搞一个和过去的作品迥然相异的东西。

“你过去的片子，环境空间都是农村或大宅院，你不觉得应当弄一个小镇上发生的事儿吗？何况小镇往往是城乡的交叉之地，具有城市和农村的某些双重特点，而且环境氛围和你过去的东西肯定会很不一样。”我继续对艺谋说。

“那好吧！反正现在也没有更好的东西可弄。《河边的错误》可以作为一种考虑。那你说由谁来改呢？”艺谋问。

“余华本人难道不行吗？”

“最好不要作家本人来改。余华是个搞先锋小说的作家，容易写着写着就照着理念去，他很可能掉在他自己的框子里出不来。最好找一个会写故事、写人物的作家改。”

于是，我分别找了几个作家，都因手头有事或有顾虑而未谈成。

这时已是1992年的11月10日，时间已迫在眉睫，再选择不到合适的东西，就势必要影响到第二年的拍摄计划。

我将所找过的几位作家的情况告知艺谋，艺谋也开始有些着急。“那怎么办？”艺谋问我。我建议艺谋是否再考虑一下由余华本人来改。我说余华虽然是写先锋小说的，但他的功力很好，过去只不过没注意写人物，如果让他把注意力放在人物上，他也未必写不好。

我顺利动员艺谋见见余华，聊一聊再做决定。艺谋表示可以。但他希望我先去找余华谈谈，看看余华本人的意思。

我当天赶到余华住处，并将艺谋计划将《河边的错误》搬上银幕的想法告

诉了余华。

余华闻讯后显得非常兴奋！他苦心经营的小说这两年影响有限，使他深为苦恼！如果自己能有一篇东西搬上银幕，无疑对扩大他的知名度和小说的影响有极大的好处。毕竟我们已处在一个依靠传播媒体的时代。

我也将艺谋对《河边的错误》的看法，向余华如实陈述。余华颇认真地听着，嘴里不时地发出“哦”的声音，眉心微微皱着，显然在琢磨艺谋对其作品的判断。“我同意艺谋的意见，《河边的错误》是我几年前的东西，那时我才写小说不久，有些想法现在看来已过时了，再让我写，我也不会那样弄了。”余华率真地说，并且表示很愿意和艺谋合作，有信心根据导演的意图再拉一稿。

我让余华将他过去的作品集，包括已发表的长篇各整理一份，我好给艺谋看看，以便更好地让他了解余华的创作实力。余华在整理的过程中，拿出一份小说的清样。他稍稍犹豫了一下，说了声：“这个就算了。”我问：“这是一篇什么小说？”余华说是给《收获》1992年最后一期发表的小说。现在对方将排印好的清样给他寄了一份。当时《收获》第六期尚未正式出版。我注意看了一眼小说的标题，上面赫然醒目地写着“活着”。我又问余华：“这篇东西能改编成电影吗？”“不能！”余华很干脆地回答。“这样吧！”我说，“我还是给艺谋把这篇也拿去看看，让他了解一下你最新的创作状况，如何？”余华当即回答：“可以，但你们必须尽快还我，因我手头就这一份。”

我出去找了一个公用电话，“呼”了一下艺谋的汉字显示呼叫器。他很快回电。我将在余华这边的情况简单说了一下，并说我拿到了一些余华写的其他小说，建议他看看；另外，我动员艺谋还是和余华当面谈谈。“我认为余华自己改挺合适。”我最后说。

电话那头的艺谋沉默了一会儿。“那好，我们今晚先见一面。你把余华的小说给我，我翻翻，和余华明天再见。”艺谋说。

按照约定时间，当晚6时，艺谋出现在我寓所旁边的国安宾馆门前。他上身穿了一件国外朋友送的面料颇讲究的美式军服，下身着一条黑色的牛仔褲。在嘈杂混乱的人群中不显山不露水地就“冒”了出来，看见我，就乐呵呵地



迎了过来。

“你吃饭了吗？”他问。

“没有。”

“那好，咱们顺便找个地方吃一顿。”他转脸四处瞟了瞟，“你说在哪儿吃？”

“你不是爱吃点烧饼什么的吗？咱们就在旁边这个东大桥市场顺便吃点小吃吧！”我说。

“好。”艺谋似乎显得很高兴。我知道他生活简朴，平时不事铺张，始终保持着普通百姓的嗜好。

我们一人要了一碗馄饨、几个烧饼，津津有味地边吃边说。我告诉艺谋，有一个西方的高级代表团来华访问，点名要见他，朋友委托我问问艺谋，能否抽空见见。艺谋听后笑笑：“这种事没有意思，都是应酬的事，哪儿有咱们谈的事有意思。”

饭后，我们回到我家，我把余华的作品交给艺谋。在给他《活着》的清样时，我专门叮嘱了一句：“这篇还没发表出来，余华催着要，是他最新的东西，让你看看，最好你明天就还我。”艺谋表示没问题。

我们一直聊到9点多，艺谋说他得走了，回去还有这一大堆小说要看。我看了看艺谋，很认真地说：“艺谋，我觉得让余华来改写很可能是最佳人选。”

艺谋没说话，但他眼神中却透出一丝疑虑。我了解他，在任何事情没有得到确实印证的情况下，他绝不轻易表示首肯。

我们再次约好，第二天上午9时整在我家和余华见面。

艺谋来时，眼睛里充满血丝，但情绪显得极饱满且兴奋，“我最初是翻余华的其他小说，又翻了余华的长篇小说。时间已经很晚了，我想起王斌告诉我《活着》明天就要还余华，我就拿起来翻了翻。最初我不知作者究竟要说什么，看着看着，觉得挺有些意思，就一直往下看。看到最后，福贵牵着一头老牛在黄昏慢慢走远，我觉得，噢！有意思，经受了那么多人生的痛苦和灾难，最后他一个人很平静地走远，这样一种命运的承受力，会使人升华出一种感慨。”

艺谋越说越激动，不时地从地毯上站起身来，手舞足蹈地比划着。末了，

他问余华：“这东西你能不能先不给别人，给我留一段？”

余华痛快地说：“没问题！我就给你留着，你什么时候拍都行。”

“嗯！谈了这么多《活着》，咱们该说说《河边的错误》了。”艺谋好像刚刚发现我们聚会的目的，已经跑题了，他发出一声“警告”。

关于《河边的错误》，他仍然认为现有的故事框架有问题，好像发现了点哲学，其实没多大的意思。但他肯定了弥漫于小说中的那种气氛。

我说是“悬疑”。

“不是！”艺谋肯定地说，“是诡异，在利用这个诡异。”

艺谋认为，小说中出现的公安人员最好在电影中不要出现，因为他会涉及到许多具体问题，处理不好，甚至会影响到影片审查，而且会使影片变成一个普通的侦探片。艺谋坚持认为要在人性上做文章，要把人物写得很实，不要像现在的小说那样仅仅是服从某种理念的符号。甚至连小说中的“疯子”都不一定要出场，他只需作为一种诡异气氛的制造者而存在。

这就无疑给他自己以及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出了个难题：因为如果改编依照他的设想，就等于要重新构造一个故事，小说中可以用的仅仅是那种阴森诡异的气氛。

艺谋建议主角应是一位年轻的女性，而且故事最好是围绕着一个家庭发生的。

最初讨论陷入困境，因为当时谁也想不出应当如何重新建构一个故事，而且得符合艺谋的要求。

只要侃剧本，艺谋的思维永远是最活跃和智慧的。这位平时不太爱说话的人，一旦进入讨论剧本的氛围，瞬间便成了一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人；而且，说着说着，就会猛不丁地冒出一个绝招来。这一次也不例外。他最初只是漫无边际、山南海北地侃着，既启发我们的思路，也捎带着启发自己。按照他自己的说法，确定拍摄《秋菊打官司》时也是这样，最初主创者们几乎所有人看完小说后都信心不足。他说他就不断地说，那时他自己心里也没数，但是说到最后，他发现他把自己给说服了，觉得必须要拍了。现在谈《河边的错误》时也